



习近平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重要论述的理论渊源、主要内容与世界意义

房维维

(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杭州 310018)

摘要: 习近平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论述, 蕴含深厚的理论渊源、科学的内容体系与突出的世界意义。其理论渊源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解放与正义战争的基本理论, 又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家国一体的精神内核, 体现了文化传承与理论创新的统一。在内容体系上, 该论述科学阐明了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伟大抗战精神的科学内涵以及抗战胜利的关键因素。在世界意义上, 该论述为应对全球和平赤字、治理赤字与文明赤字提供了中国方案, 体现了中国在构建公正、合理与包容的国际治理秩序中作出的重要贡献。

关键词: 习近平;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伟大抗战精神; 全球治理

中图分类号: D642; K26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26)02-0012-06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ourses on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oretical origins, main content and global significance

FANG Weiwei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ourses on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embody profound theoretical origins, a rigorous content system, and significant global implication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these discourses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Marxism classics on national liberation and just war, while also inheriting the spiritual essence of perseverance and unity of family and nation embedded in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thereby demonstrating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al continuity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n terms of content, Xi's discourses systematically elucidate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the great spirit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the key factors leading to victory. In the dimension of world significance, these discourses provide China's approach to addressing the global deficits in peace, governance, and civilization, and reflect China's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building a just, rational, and inclusive system of global governance.

Key words: Xi Jinping;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 great spirit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global governance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紧扣新时代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任务,立足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历史进程,围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作出了一系列富有历史深度和时代高度的重要论述,形成了内涵丰富、逻辑严谨、体系完备的内容体系^[1]。这不仅是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经验的系统总结,更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历史观、民族观、世界观、和平观的集中体现,彰显出鲜明的人民性、坚定的民族主权意识与胸怀天下的世界观。

近年来,学术界围绕习近平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论述,展开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抗战精神、历史地位与时代价值等方面。部分学者从理论逻辑与史观体系出发,剖析了习近平相关论述的生成逻辑与核心要义,指出其论述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并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思想精华^[2-3]。也有研究聚焦历史记忆与文化遗产,强调抗战精神在新时代的教育功能与价值意义,认为其不仅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精神资源,也是构建国家认同和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思想力量^[4]。此外,学界还从风险意识、文化自信、守正创新等视角拓展研究,进一步深化了对习近平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论述时代价值的理解^[5-6]。

尽管既有研究成果为深入理解习近平关于抗日战争的重要论述奠定了一定基础,但整体而言,相关研究呈现出碎片化特征,尚未对这一重要论述展开系统性梳理。因此,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全面梳理习近平关于抗日战争重要论述的理论渊源、主要内容及世界意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一、习近平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重要论述的理论渊源

任何科学的理论皆有其理论渊源。习近平关于抗日战争的重要论述,既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解放与正义战争基本理论的影响,又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体现出历史延续性与理论创新性的统一。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解放与正义战争的相关理论

马克思主义对民族解放与正义战争问题予以高度关注。相关论著不仅深入剖析了民族压迫的历史渊源,还系统阐释了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合理性与历史必然性,构建起较为完备的民族解放战争理论体系,其基本观点主要包含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民族解放战争是反对压迫、争取独立的正

义之战。在帝国主义主导的殖民体系中,被压迫民族通过武装斗争谋求民族独立与人民自由,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历史运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民族独立斗争是革命的国际主义立场。”^[7]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相互依存,任一民族均无法在压迫其他民族的基础上达成自身的真正解放,反对民族压迫、推动民族独立具有正义性。

第二,正义战争是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正义战争不仅是反抗外来压迫的行动,也是社会内在阶级矛盾激化的外在体现,更是推动旧制度崩溃与新制度建立的重要形式。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正义论,指出:“每当资产阶级的奴隶和被压迫者起来反对主人的时候,这种秩序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的凶残面目。”^[8]可见,资产阶级鼓吹的“正义”,往往掩盖着维护既得利益的虚伪本质;而无产阶级反抗压迫、争取解放的斗争才是真正的正义。它揭示了历史发展的真实动力,并以革命性的方式推动社会不断前进。

第三,必须坚持阶级立场分析战争的性质。区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根本标准,在于是否服务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对于帝国主义争霸背景下发动的侵略战争,应坚决反对;而对于以推翻压迫、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为目标的战争,则应积极支持。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那样,英法统治阶级在克里木战争中虽然口头上鼓吹“自由与文明”,实则仅为维护既有秩序、财产关系和宗教权威,并无意彻底摧毁沙皇俄国这一反动支柱。他们力图通过有限冲突来削弱俄国军事实力,却始终设法将战争局限在特定范围内,以防其演变为全欧范围的革命性战争。相反,马克思恩格斯从无产阶级革命利益和欧洲民主运动大势出发,明确主张应当把这场局部冲突引向全欧范围反对沙皇专制的战争,把它作为预示更深刻、更具决定意义斗争的序幕,即欧洲各国人民共同反对自以为稳固的专制暴政的历史性战斗的开端^[9]。

第四,坚持国际联合是正义战争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深刻指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具有国际性,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0]66},共同反对殖民主义与霸权主义。《共产党宣言》中“工人没有祖国”^{[10]50}的论断,并非否定民族立场,而是强调在无产阶级解放的崇高目标下,各国无产阶级应超越地域界限,相互支援。这一原则在民族解放战争中体现得尤为突出。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既是捍卫本国主权独立的必要行动,也是国际反

压迫阵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胜利离不开广泛的国际支持与合作。因此,正义战争不仅服务于民族利益,也推动着国际公平正义秩序的构建,是实现人类自由与解放进程的关键一环。

此外,十月革命后,列宁深入分析民族解放与正义战争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推动了该理论体系的发展。他指出,被压迫民族为反抗殖民统治、争取国家独立而发动的战争,“从我们方面来说就会是正当的和正义的战争”^[1]。面对帝国主义主导的世界格局,列宁强调,弱小民族的反侵略斗争具有普遍意义,且必须获得国际无产阶级支持。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解放和正义战争理论的深化,也揭示了对殖民主义所造成的全球结构性不平等及其反抗斗争的内在正义性。

(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承继

精神承继,指的是在历史延续进程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核心精神予以继承与弘扬的过程。习近平关于抗日战争的重要论述,其精神承继既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在新时代实现了对伟大抗战精神的创新性发展。

伟大抗战精神所蕴含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正是中华民族精神谱系的生动写照与集中体现。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灵魂。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在苦难中奋起、在灾难中重生,正是因为自古以来便积淀了坚韧不屈、自强不息的精神内核。这种精神内核早在先秦时期便可见其雏形。孔子提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孟子强调“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二者共同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塑造的坚韧不拔、勇于担当、为道献身的理想人格。此理想人格与抗战时期无数中华儿女视死如归的英勇壮举相互呼应,形成了贯通古今的精神传承。习近平高度重视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养分,他在讲话中多次引用“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位卑未敢忘忧国”等名句,深刻阐释了中华儿女于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的责任担当,这种精神与抗战精神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行动信条和“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一脉相承。此外,习近平强调弘扬“家国情怀”,提倡“把小我融入大我”的理念。这一思想源自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在抗战时期内化为全民族的价值认同,并转化为无数人民群众在国家危难时刻“舍小家为大家”的爱国救亡行动,

既体现了个体与国家的紧密联系,也成为抗战时期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奋战的精神动力。

综上所述,习近平有关抗日战争的重要论述,其精神传承并非对历史记忆的机械再现,而是立足于中华民族精神的深厚底蕴,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家国担当、精神坚守以及处世智慧加以转化,激发其在新语境下的生命力,实现创造性发展。

二、习近平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论述主要围绕其历史地位、伟大抗战精神的科学内涵以及抗战胜利的关键因素三个方面展开。

(一)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

习近平着重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在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程中均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

一方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历史转折点。习近平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1],并强调“这一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洗刷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1]。它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与自由、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历史转折点。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不仅是全体中华儿女为国家生存、民族复兴和人类正义进行的一场殊死搏斗,更是一次社会动员空前广泛、民族觉醒空前深刻、战斗意志空前顽强、必胜信念空前坚定的伟大实践。学界普遍认为,抗战胜利是“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由被动抗争走向主动胜利的历史性跨越”^[12],为中国彻底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实现民族独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另一方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救亡中的中流砥柱地位。习近平明确:“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1]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开辟广大敌后战场,始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引领夺取战争胜利的民族先锋。此外,习近平特别提到:“毛泽东同志总结革命斗争经验,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概括为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为我们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今依然发挥

着重要作用。”^[13]这“三大法宝”正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引领抗日战争胜利的核心力量。

(二) 抗战精神的科学内涵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孕育了伟大的抗战精神,其科学内涵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集体责任观。该观念超越了朴素的情感层面,升华为将个体命运与国家兴衰紧密联结的集体责任感。而这种责任感,深植于中华文化“家国同构”的伦理结构之中: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排序,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实践抉择,无不深刻体现着个体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存续所肩负的不可推卸的责任。抗战时期,正是这种基于集体责任感的爱国情怀,成为动员亿万民众投身救亡图存洪流的精神旗帜。以1937年的“平型关大捷”为例,八路军第115师在林彪、聂荣臻的指挥下,成功伏击并重创日军“坂垣师团”^①辎重部队^{[14]343}。可见,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体责任观,构成了中华民族面对生死存亡时的重要精神资源。

第二,“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生命价值观。在抗战这一特定历史场域中,“视死如归”的生命价值观具体化为以“民族气节”为主导的生命价值话语。它将个体生命的终结与民族大义的持守相联结,构建出一套超越生物性生存的价值观,进而塑造了主体“向死而生”的认知结构与行动模式。狼牙山五壮士的集体壮烈殉国,正是这一生命价值观的崇高诠释与不朽见证。

第三,“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革命意志观。革命意志观是在外部极限施压下形成的民族意志,其本质是以“血战到底”的集体行动捍卫民族尊严。淞沪会战历时3个月,给日本侵略军“速战速决”战略以沉重打击,使日本陆军和空军遭到七七事变以来前所未有的打击和损失^{[14]279}。谢晋元率领“八百壮士”在苏州河北岸四行仓库展开誓死坚守的孤军之战,这场被中外舆论广泛关注的壮烈战斗,其意义远超军事层面,成为唤醒国魂、激励全民抗战的精神号角。

第四,“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历史主动性。其本质可理解为一种基于历史发展规律的理性自觉。正义必胜的坚定信念与民族必兴的历史信心,作为支撑伟大抗战精神的核心动力,二者相辅相成,形成了“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历史主动。尽管在抗日战争中面临敌强我弱、资源匮乏、外部封锁和内部动荡等重重困境,中国人民依然坚定不移地坚持斗争。以重庆大轰炸期间的民众反应为例,面对日本飞机

持续的战略轰炸和心理恐慌,重庆市民并非被动忍耐,而是主动组织起防空救护、生产自救与精神动员。工厂迁入防空洞继续生产,妇女儿童参与防火、防护和宣传工作,新闻媒体则以笔为枪鼓舞士气。这种在极端艰苦条件下自觉维系城市运转、支援前线的行为,正是中国人民在灾难中主动承担民族救亡责任的生动体现。正如《国民公报》一社论所言:“轰炸虽使重庆市民遭受惨痛的牺牲,但同时每个人均在轰炸中求得优良的锻炼和进步。”^[15]日寇灭绝人性的暴行,不仅未让重庆人民屈服,反而极大激发了民众无限的愤怒和仇恨,增强了全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

(三)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关键在于党的领导、人民群众的力量及其斗争精神。

第一,党的领导是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抗日战争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更是引领抗战走向胜利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论述,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1]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实现了民族革命力量的重组,以先进的政治理念、科学的战略部署和坚实的群众基础,为民族解放指明了方向。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发挥中流砥柱作用,根本在于其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自觉。通过确立全面抗战路线、持久战战略和统一战线方针,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抗战由局部到全国、由军事抵抗到全民抗战的转变,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核心的社会动员机制。中国共产党以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凝聚全民族抗战力量,充分说明了党的领导是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

第二,人民群众是抗战胜利的决定力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既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更依赖亿万民众用鲜血和生命支撑起东方主战场。抗战的正义事业赢得了深厚民心,进而转化为广泛的群众动员,由此铸就的人民伟力构成了持久抗战并获得完全胜利的力量根基。如重庆在数年的惨烈空袭中,百姓未被摧毁意志,反而“毁家纾难、慷慨捐输”,由此孕育出顽强的“重庆抗战精神”,这种人民自发的坚守与奉献,为后方战局

① 坂垣师团是日军早期组建的七个主力师团之一,也是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日本常备的十七个师团之一。该师团曾与七十多个中国师先后交战,因其作战能力较强,被称为“钢军”。

稳定和全国抗战胜利筑牢了坚实支撑^[14]。同时,为最大限度地拓展抗战的群众基础,党在敌后根据地创造性运用统一战线策略,广泛吸纳并有效改造哥老会、红枪会等民间社团,将其纳入全民抗战的洪流。由此可见,只有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发挥其主体性,才能形成压倒一切困难的整体力量。

第三,斗争精神是抗战胜利的力量源泉。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在斗争中成长和壮大起来的,斗争精神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1]抗日战争正是这种伟大斗争精神的集中体现。面对敌强我弱、局势严峻复杂的现实,中国共产党以坚定信仰与坚韧意志,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赢得胜利。斗争精神成为凝聚民族力量、激发抗战意志的精神支撑,是民族抗战胜利的精神源泉。同时,斗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革命实践中的生动运用。它转化为全民族的坚强意志与战略定力,使中国人民在民族危亡关头“越是艰险越向前”^[1],以持久斗争构筑起民族救亡的精神长城。

三、习近平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重要论述的世界意义

习近平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论述具有突出的世界意义,既为当下人类所面临的和平还是战争、对话还是对抗、共赢还是零和的抉择指明了正确方向,也为推进并引领全球治理开辟了新路径,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应对全球和平赤字,牢记历史教训,唤起人们对和平的珍视

当今世界,和平赤字问题日益突出。地区冲突频繁爆发,大国竞争加剧,全球治理效能失衡,人类和平事业面临严峻考验。习近平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1]这深刻揭示了牢记抗战历史、汲取战争教训,对于当今世界应对和平赤字、维护和平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不仅是中华民族争取独立与解放的伟大壮举,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争取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1]抗

战的胜利,不仅捍卫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而且彻底挫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企图殖民奴役中国的侵略图谋,从而扭转了近代以来中国屡遭外侮、屡战屡败的历史被动局面。在这场伟大斗争中,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支撑起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牢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为了守护和平。习近平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我们谴责侵略者的残暴,是要唤起善良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而不是要延续仇恨。”^[1]因此,唯有坚持合作共赢、反对霸权强权,才能构建持久和平的国际秩序。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让和平的阳光永远普照人类生活的星球”^[1]。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要“珍视和平、警示未来,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1]。在全球和平赤字加剧的当下,牢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有助于凝聚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共识,唤起人类对和平的珍视。

(二)应对全球治理赤字,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不仅是民族独立的伟大胜利,也是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重大历史实践。抗战的胜利表明,国际正义并非由强权赋予的制度结果,而是以弱胜强、以正压邪的集体抗争所实现的历史必然。正如习近平强调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不容置疑,几千万人为独立、自由、和平付出的牺牲不容否定。”^[1]抗战胜利事实证明,正义力量最终能够战胜霸权与侵略,人民力量终将决定历史走向。由此可见,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倡导公平正义的理念,植根于包括抗战在内的历史经验。

一方面,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在全球力量格局极度失衡的历史条件下,通过长期斗争赢得的重大胜利。这表明,民族独立是实现国际公平正义的前提,自主自立是弱势国家打破强权结构的根本路径。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支撑起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提供了现实基础与道义支撑。由此形成的以正义、和平、合作为核心的国际秩序观,成为中国在新时代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思想资源。另一方面,习近平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论述,揭示了正义秩序的内在生成逻辑。他指出:“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并且希望世界各国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1]这深刻体现出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全球治理理念,是抗战精神在当代国

际关系语境下的理论升华。

当今全球面临的全球治理赤字问题,与 20 世纪上半叶国际体系失衡的历史困局存在相似性。单边主义与霸权主义的兴起,本质上体现了部分国家对国际正义原则的偏离。面对这种形势,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等制度性实践,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这不仅是对伟大抗战精神的时代传承,更体现了中国在新的国际格局中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历史自觉与实践担当。

(三)应对全球文明交流困境,坚持对话协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世纪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全球文明交流正面临严峻挑战。而人类命运自始至终休戚与共。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以巨大牺牲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不仅塑造了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身份,也为中国在全球事务中承担道义责任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始终倡导通过文明互鉴与交流合作,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将抗战精神所蕴含的崇尚和平、捍卫正义的核心理念,升华为构建国际和平秩序的制度诉求。习近平在重要外交场合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强调在全球性危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置身事外、独善其身”^[16],展现了对全球治理格局深刻的战略思考与大国责任担当。这一理念体现了从“民族主体”走向“全球共同体”的伦理演进。自 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持续深化文明对话,通过开展文化年、艺术节等多样化活动,推进民心相通项目的落地,教育、科技、文化、体育、旅游、医疗和考古等领域的人文合作不断扩展。与此同时,议会、政党、社会组织以及妇女、青年、残障人群等各类主体间的互动日益频繁,逐步形成了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格局。

综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有助于缓解当前的全球文明交流困境,更可为全球治理提供新路径。对话协商是化解分歧的有效之策,政治谈判是解决冲突的根本之道。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需坚持以对话协商的和平方式,反对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四、结 语

习近平关于抗日战争的重要论述,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解放与正义战争的基本理论,也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主要包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抗战精神的科学内涵、抗战胜利的关键因素等。这一系列论述为剖析当代中国在应对全球和平赤字、全球治理赤字以及全球文明交流互鉴困境等关键问题时所展现的理念逻辑与行动趋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与价值启迪。诚然,本文仍存在一定局限,例如对相关论述文本语义的历史演变探究尚需深入。未来研究可进一步融合全球治理与国际传播视角,探寻抗战精神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的现实转化路径。总体而言,习近平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论述以宽广的历史视野和深邃的世界眼光,汇聚了新时代中国维护和平、捍卫正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思想动力。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彼岸奋勇前进[J]. 求是, 2025(17): 4-16.
- [2] 李孝纯. 论中国的抗战精神[J]. 社会科学辑刊, 2005(5): 138-140.
- [3] 罗永宽, 吴迪. 系统领会习近平关于政治认同的重要论述[J]. 理论探索, 2024(2): 36-42.
- [4] 李宇轩, 齐霁.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核心要义、重要特征与时代价值[J]. 兰州学刊, 2025(4): 14-22.
- [5] 于杨, 张豪永. 习近平抗战史观的核心要义、理论特质与实践要求[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9(4): 102-114.
- [6] 李春峰. 抗战时期邓小平经济建设思想探析[J]. 党的文献, 2013(5): 72-79.
- [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696.
- [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73-174.
- [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3.
- [1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1] 列宁. 列宁全集: 第 28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0: 88.
- [12] 杨奎松. 抗日战争研究理应重视战争史研究[J]. 抗日战争研究, 2016(1): 22-25.
- [13]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422.
- [14] 张宪文. 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15] 镇静奋斗, 教济难胞[N]. 国民公报, 1940-08-22(3).
- [16]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2 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535.

(责任编辑:陈丽琼)